

# 序 章

二战结束前的日本近代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时期——明治时期、大正时期与昭和前期。从日本近代社会发展史的连续性来看，明治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确立期；大正时期是在国内外环境巨变的影响下，社会求变、人心思变以及重新抉择国家发展方向的时期；昭和前期则是国家走向歧途的时期。从因果论的角度讲，昭和前期的误入歧途恰好是大正时期的“重新抉择”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可见大正时期在日本近代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值得重视。

大正时期（1912年至1926年）在日本近代史上仅存15年，故有人将大正时期的文化表现视为“一朵美丽的谎花”<sup>②</sup>。日本的一般民众也是将大正时期视为一个简单的中间过渡期<sup>③</sup>。实际上，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大正时期是承接明治时期而来的，是

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序”，第5页。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84页。

松尾尊兑：《大正德谟克拉西》，岩波书店1974年版“前言”，第5页。

模仿欧美政体模式，进一步推进议会主义<sup>①</sup>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从大正时期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多种政治思潮的竞相迸发以及国民心态的危机等角度来观察，大正时期是“彷徨”的、动荡的、重新探索国家发展方向的历史时期。在以往日本近代史研究中，对明治维新及昭和法西斯战争进行研究的论文、专著较多，而以大正时期为中心展开研究的著述则很少。就大正时期在整个日本近代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而言，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研究。而且，为了考察日本政治思潮的历史连续性，必须对大正时期进行缜密思考与细致研究。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具有反作用。大正时期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及多种政治思潮的并存，是社会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例如，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阶级构成的分化。分化的社会各阶级有各种欲求，当某种欲求成为某一集团的共同倾向时，就形成了一种思潮。当这种思潮掌握了绝大多数民众，又能得到权力所有者认可的时候，阶级欲求便会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这是社会意识具有反作用的集中表现。政治思潮是关于建设国体、政体及社会的思想倾向，它具有超前性与滞后性的双重特点。各种政治思潮虽然都是社会改革、社会改良或社会革命的思想先导，但其具体性质直接关系到调整后的社会性质。纵观日本近代以来各时期的思潮与现代化的关系，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思潮是推动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大正时期的“民本主义”思潮曾一度取得过胜利（出现了广大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民众所期待的政党政治），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现代化进程；而在进入昭和初期后，“皇室中心主义”及“超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又迫使“民本主义”思潮逐渐褪色，

<sup>①</sup>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541 页。

从而割断了日本现代化进程，将国家引入法西斯战争的泥潭。那么，为什么大正时期的“民本主义”思潮取得过胜利但又未能保持下去？这与大正时期的国内外环境及各种政治思潮的变化及力量对比密切相关。乍一看来，从一个相对发达的民主阶段过渡到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但这恰恰说明对大正时期政治思潮的研究尚待深入。

诚然，统治阶级发动大规模战争是以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的变化为前提的。其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及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是导致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但面对种种危机的挑战，可以有不同的对应策略。即是说，并非战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也存在着和平的、依靠国家的内部调整来摆脱危机的对应策略。例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是依靠政府力量进行经济调节，并对周边环境所做出的反应。战争的爆发，除了有经济根源之外，时代的氛围也与其密切相关。换句话说，针对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不同思想的人会提出不同的解决对策，种种探索国家发展方向的政治思潮并存并彼此交锋，力图成为某一时期的主流思潮并影响政府，进而成为那个时期国民精神的统合力量。

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sup>①</sup>如果“歪理邪说”掌握了群众，同样也可以转化为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从近代日本的发展史来看，日本群众盲从对外侵略战争，就是“歪理邪说”掌握了群众的佐证。在这个意义上，制造“歪理邪说”的人就是罪魁祸首。

如所周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决定的因素”，而人则是一切生产力中的最活跃因素。例如，战争的参与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第 9 页。

者、国家建设的指导者、战争的指导者，都是人这一最具能动作用的实体。然而，是哪部分人起了主导作用？哪部分人的思想意识及行动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发展方向？很显然，那绝不是普通的劳动者，应该是每一时期的权力所有者及掌握一定知识技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为权力所有者出谋划策，是权力者的“智囊团”。另外，还可以说知识分子是不同时期活跃的各种政治思潮的载体。他们的思想左右着时代整体思潮的发展方向。

迄今为止，在有关日本走向法西斯战争轨道的原因探析中，经济危机是导致战争主要根源的观点，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确，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它代表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经济变动及经济危机将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其主要表现为，经济上短暂的虚假繁荣与经济萧条的频繁交替、政治上内阁更换频繁、外交上更加难以对付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政治思潮的纷繁复杂及其交锋等等。日本的大正时期即是最好的例证。这正如在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与经济状况相适应，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与不同的学派，如儒、墨、名、法、道、兵、纵横、阴阳等等。他们之间的争辩与讨论，带来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并且，这种交织复杂的思想又会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外交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反作用。甚至，这种反作用有时会成为决定性因素的重要侧面。由此观之，为了全面地把握日本走上法西斯战争轨道的原因，有必要将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的舆论导向列为研究的主题。

另外，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政治思潮的多样化，说明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要想达到社会价值观的相对一致，必然需要各种政治思潮之间的争斗与“磨合”。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最活跃。他们参与辩论，组织运动，致力于将思想转化为行动的力量。并且，他们力图在动态中保持社会的相对平衡。因此，从这

个意义上讲，探讨大正时期不同类型的政治思潮及其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也十分重要。

大正时期是知识分子及政治思潮异常活跃的历史时期，按其政治思潮的具体内容可以分为六大类，即“国家主义、皇室中心主义思潮”、“民本主义思潮”、“超国家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理想主义思潮”、“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思潮”等。从政治思潮、知识分子与社会运动的关系，以及政治思潮对国家发展方向影响程度的角度出发，笔者将前五类思潮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这五类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德富苏峰、吉野作造、北一辉、大杉荣及武者小路实笃等。“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暂未触及，拟在今后研究中主题讨论，相信不致影响本书所要解决的主题及结构的完整性。

如果从民主运动的角度来观察问题，那么毫无疑问，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掀起了日本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民主运动高潮。继之，大正德谟克拉西运动是第二次民主运动的高潮<sup>①</sup>。这两次运动，都以吸收欧美先进国家的民主制度为目的。从社会运动的整体性来说，大正德谟克拉西运动也只是大正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而且，不同类型的政治思潮体现了社会运动各组成部分的大体要求。但是，这些运动以“欧化”<sup>②</sup>与“反欧化”交织在一起

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40 页。

关于“欧化”的内涵，中日学者多将其解释为一种文化思潮。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汤重南先生认为，“欧化”运动开始于明治初年的“文明开化”，“鹿鸣馆”时代发展到极致（叶渭渠主编：《日本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7—299 页）。明治时期的思想家陆羯南认为，“国内的近代化 = 欧化”。受到上述两种观点的影响，笔者从社会学角度给“欧化”下了定义，并认为“欧化”是增强社会现代性的动态的历史过程。

为特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法西斯战争爆发以前，日本近代史即是“欧化”与“反欧化”运动的矛盾斗争史。不言而喻，明治知识分子与大正知识分子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即是说，他们之中既存在力主“欧化”的知识分子，也存在提倡“反欧化”的知识分子。“欧化”与“反欧化”之间的争斗，反映了思想传统的连续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它们将国家引向何种发展轨道，与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密切相关。

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大正时期是继明治时期进一步推进“欧化”的历史时期。“欧化”是一个过程，是一场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讲，“欧化”就是现代化过程。那么，为什么用“欧化”概念而不用“现代化”概念？日本“欧化”运动的实质是什么？“欧化”与政治思潮之间的关系如何？大正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欧化”与“反欧化”运动中的社会作用如何？大正时期的不同阶段；各种政治思潮之间的争斗与“磨合”的结果如何？哪种思潮曾经取得过胜利及哪类知识分子的思想曾经成为主流思想？每类知识分子在大正时期的地位及特点如何？研究历史，关注现实，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与当前日本的政治思潮有哪些联系？知识分子的前瞻性与潜在的危险性如何？等等，都是本书应该给予回答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掌握大量的基础资料及相关的研究资料，并且需要对那些资料进行细密的梳理与分类。然后，还需要带着上述的问题意识进行缜密的思考，以求得出近于客观的结论。

大正时期是时代的转型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从大正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及国民心态等方面都可得到印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多种政治思潮的存在即是证明。社会意识又具有反作用，最终成为某一时期精神整合力量的思想即是象征。有时候，这种反作用大得不可忽视。因此，从政治思潮与知识分

子着手，可将大正时期纷繁复杂的历史梳理清晰，并有利于抓住大正转型期的主要脉络。

大正时期是一个“彷徨”、动荡的时期，与当前日本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与日本当前某些政治思潮有内在的历史连续性。当今的右翼思潮是对“皇室中心主义”思潮及“超国家主义”思潮的继承。因此，研究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 二

国内方面，在笔者所知的范围内，至今尚未发现以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为题展开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但笔者发现一本以明治时期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即李永炽的《日本的近代化与知识分子》（台湾水牛出版社 1970 年）。作者在书中主要探讨了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以及知识分子在近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以加藤弘之的早期思想和荒尾精代表的国粹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为个案研究，阐明了日本在 19 世纪对欧洲民主的吸收状况，明确了 19 世纪末期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趋向。另外，关于不同个案人物，在国内虽然没有相关的研究专著，但是相关文章还能找到几篇。例如，关于对德富苏峰的研究，有汤重南先生的《从欧化风潮到保存国粹运动》（叶渭渠主编《日本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作者主要阐明了明治二十年代的德富苏峰，作为“反欧化”的先锋向“国家主义”转变的思想轨迹。关于对吉野作造的研究，有俞辛焯的《吉野作造与五四运动》（《近代日本研究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李玉的《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与大正民主运动》（《外国问题研究》1986 年第 1 期）、《试论日本的大正民主运动》（《北京大学学报》1986 年第 2 期）。俞先生的论文，以吉野作造对中国“五四”运动的

态度以及民本主义思想基础问题为切入点，对吉野作造进行了中肯的评价。李玉先生的论文，对吉野作造民本主义思想的内容、阶级倾向及其在大正民主运动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说明与分析。关于对北一辉的研究，王金林的《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构成》（《日本研究》1995年第4期）一文，将北一辉视为“民间法西斯主义”思想家，指出了北一辉“天皇观”前后矛盾性及欺骗性，分析了他在对外侵略上比之丰臣秀吉更具野心。盛邦和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主要探讨了“日本亚洲主义”内在的逻辑发展过程，即由早期的“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演绎出“文化亚洲”观点，进而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赵哲的《北一辉思想及其对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影响初探》（《日本研究》1985年第3期）一文，探讨了北一辉的社会观，论述了北一辉的政治观、经济改造思想和社会改造论，以及这些改造思想对法西斯运动产生的影响。汤重南与李玉在《太平洋战争新论》一书中也对北一辉及其法西斯主义思想进行了论述。关于对武者小路实笃的研究，刘春英的《“白桦”时代的武者小路实笃》（《外国问题研究》1984年第1期）一文，主要分析了武者小路实笃在1910年至1923年的作品及其思想。刘立善的《论武者小路的‘妹妹’》（《日本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以武者小路实笃的五幕剧《他的妹妹》为主，阐述了武者小路的反战思想及人道主义精神。

国外方面，直接研究此题目的著述并不多见。但在金原左门编的《大正德谟克拉西》一书中，主要从知识分子与大正民主运动关系的角度探讨了知识分子的前瞻性、组织领导作用以及大正知识分子本身性格的转变。滨口晴彦著的《日本的知识人与社会运动》一书，是按历史的发展脉络来探讨知识分子与社会运动关系的一部力作。他从社会运动及其组织团体的角度出发，研究了

明治、大正、昭和年间的知识分子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加藤周一、久野收编辑的《近代日本思想史讲座 4·知识分子的产生与作用》（筑摩书房 1959 年）一书，首先对知识分子进行了类型划分，然后在历史的变动中把握每一类型知识分子的特征。全书从“维新变革与近代知识分子的诞生”写起，一直写到“战争（十五年战争）与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一部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衍生史。坂本多加雄的《知识分子——大正昭和精神史断章》（读卖新闻社 1996 年），从精神的角度探讨了大正、昭和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涯及活动。在本书所选的个案人物中，除了北一辉外，该书对其他四位知识分子都有所触及。松田道雄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筑摩书房 1965 年）主要探讨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在近代化中的作用，即“西欧派”和“国粹派”之间的论争与近代化的关系。松本三之介的《近代日本知的状况》（中央公论社 1974 年）一书中，有两部分论及了大正时期的知识分子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思想。小田实的《日本的知识分子》（筑摩书房 1985 年）一书，根据历史的发展脉络，探讨了“日本的近代化和知识分子的变迁”<sup>①</sup>。此外，江口圭一的《大正德谟克拉西》（学生社 1976 年）和松尾尊允的《大正德谟克拉西》（岩波书店 1974 年）这两本著作，以大正民主运动为核心，对大正时期进行了总体上的描述。至于思潮，也主要以民本主义思潮为主。

对大正时期的知识分子进行研究的文章，根据 1975 年至 2000 年的《杂志记事索引》记载，只有 5 篇文章。

由此观之，在日本真正以政治思潮与大正知识分子为题的研究著作及论文也不多见。这正说明对“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但是，针对本书所选择的 5 个个案人物，应该说研究资料并不少见。但由于条件的局限性，有些材料

<sup>①</sup> 小田实：《日本的知识分子》筑摩书房 1985 年版，第 7—35 页。

在国内还难以找到。

对德富苏峰的研究。杉井六郎的《德富苏峰研究》（法政大学出版社 1977 年），是以青年时期德富苏峰为核心展开研究的力作。自 1975 年至 2000 年，有关德富苏峰的研究论文共有 59 篇。在此不一一列举。根据所找到的基础资料和研究资料，本书第二章主要分析了知识分子人格转换的双向性与单向性及思想变异的“双刃剑”问题，指出了德富苏峰人格断裂的过程及表现，并阐明德富苏峰及其“皇室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及作用。并进一步指出，德富苏峰的思想成为军部法西斯主义及皇室和天皇制官僚集团的法西斯主义的助力。可以看出，德富苏峰是日本传统政治文化的牺牲品。

对吉野作造的研究，有井出武三郎的《吉野作造及其时代——大正德谟克拉西的政治思想断章》（日本评论社 1988 年）一书。有关的研究论文共有 89 篇。第三章运用掌握的资料，借助阿尔蒙德的“政治体系”与“环境”的关系理论，分析了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思潮对政治结构的影响及收到的政治实效。从整体的心理结构来看，吉野作造属于合理推动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类型。他试图将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模式引入日本的政治体系之中。但是，当传统的强大政治文化复活并发挥效能时，吉野作造的政治文化模式则逐渐让位。

对北一辉的研究，有宫本盛太郎的《北一辉研究》（有斐阁 1976 年），G.M. 威尔逊的《北一辉与日本的近代》（劲草书房 1989 年），冈本幸治的《北一辉》（密涅瓦书房 1996 年），长谷川义记的《北一辉》（纪伊国屋书店 1981 年），岩濑昌登的《北一辉与超国家主义》（雄山阁 1974 年）等专著。有关研究论文共有 77 篇。第四章梳理了北一辉思想的发展脉络，并指出了其思想的危险性。并且，运用法国心理学家勒庞的“群体心理学”理论，分析了北一辉的“超国家主义”是如何巧妙地迎合了以下级

青年将校军官为首的部分民众的心理，推动日本民间法西斯化进程的。可以认为，北一辉的思想历程，说明日本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在“欧化”运动中的畸形发展。

对大杉荣的研究，有大泽正道的《大杉荣研究》（法政大学出版社 1977 年）。相关的研究论文共有 45 篇。大杉荣的主要特点在于对整个时代的“叛逆”。大杉荣“叛逆”性格的形成格外引人注目。他的“叛逆”性格的形成过程，恰好验证了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的“个体生活风格”的形成理论。正是由于他的叛逆性，传统的政治文化才会发动巨大的效能将“无政府主义”思想及运动扼杀。

对武者小路实笃的研究，共有论文 167 篇。由于条件的限制，上述的绝大多数论文在国内都难以找到。武者小路实笃等“白桦派”作家们的思想，代表了大正时期文化上的“理想主义”。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思想及行动都表现出一定的边缘化倾向，失败是其归宿。

另外，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陶东风的《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 1999 年）、张分田的《亦主亦奴——中国古代官僚的社会人格》（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及许纪霖的《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学林出版社 1991 年）等著作，都给予了笔者有益的启示。

综上所述，在以往与该专题相关的研究中，中日学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虽存在以人物个案为对象展开研究的论文或专著，但是没有系统研究。即是说，没有对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进行系统研究，在考察人物个案时也没有将其置于整体思潮之中来加以把握。这是中日学界对该专题研究所存在的局限性。

## 三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结合现代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研究手段，对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产生的背景、知识分子的类型、每类知识分子个案代表的思想状况及社会作用进行分析。政治思潮是一个涉及社会发展方向的复杂问题，并且与社会运动密切相关，所以笔者力图从社会运动与社会体制的关系的角度，说明政治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关系以及社会运动的功能。对人物个案进行研究时，自然会涉及日本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诸多专门史。

研究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涉及到的基本理论问题有：“欧化”、政治思潮、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问题，“欧化”的实质问题，知识分子在“欧化”与“反欧化”运动中的作用问题。

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所谓的“欧化”，就是非欧美国家以欧美先进国家的发展为样板，致力于把本民族或本国也发展或转化成那样的国家或近似于那样的国家。“欧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充满着现代性因素的生长及其与传统因素的冲撞与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讲，“欧化”具有向现代转型的意义。那么，为什么用“欧化”这一概念，而不用“现代化”的概念呢？从历史发生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即 18 世纪工业革命以及政治革命的长期结果，革命促进了几个国家进入国际领先地位，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模仿和赶超的进程”<sup>①</sup>。也就是说，“现代化”这一概念，原本起源于西欧，它是土生土

<sup>①</sup>（德）沃尔夫冈·查普夫著，陈黎、陆宏成译：《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 页。

长于欧洲的一个概念。而“欧化”概念则清楚地表明了亚洲，尤其是日本推动社会现代转型的特殊性。因此，可以认为分析东亚国家现代化过程时，选用“欧化”概念比较合适。大正时期政治思潮是在大正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一种思想倾向。不言而喻，知识分子在这些思潮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可以说，三者之间存在着互动效应。即“欧化”是现代化过程，政治思潮是“欧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手段与要求，知识分子是为完成“欧化”过程、为满足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与要求的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

那么，日本“欧化”运动的实质是什么？简单说来，“欧化”实际上是日本社会系统在其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即：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上，仿效欧美先进国家，增强日本社会的现代性并使其发生转型的历史过程。其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转型较容易，文化结构的转型则步履维艰。这主要是由于文化结构的转型不只在技术、制度与运作层面，更主要的是在于精神层面。然而，精神层面的东西只能通过其自身的创造活动产生出来。纵观日本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并对之解读、消化乃至创新就是新的文化精神的创生过程。一个现代性充沛的社会，应该是吸纳了 18 世纪以来出现于欧洲的社会生活方式与组织方式的社会，并且社会系统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相互协调、相互适应。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文化结构”转型的结果就成了判断“欧化”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那么，我们又如何判断文化结构是否发生了转型？第一章提出了三个指标，即承担传播任务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结构的变化；传播手段、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及传播机构的出现；居于文化结构核心地位的教育体制的转型。前两者属于渐进的量变过程，后者则是量变的积累所带来的质的飞跃。

政治思潮是反映不同阶级及阶层从整体上对建立何种国体、

何种政体及何种社会的思想倾向。根据政治思潮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可将其分为保守的或反动的、革命的或改良的。如果从政治思潮与新社会构想之间的关系看，可将其分为科学的、合理的、空想的。例如，德富苏峰的“国家主义、皇室中心主义”属于保守类型，当然他是“反欧化”的。北一辉的“超国家主义”属于反动类型的政治思潮，是“欧化”的畸形发展。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是属于合理的改良类型，是推动“欧化”运动正确发展的指导思想。大杉荣的“无政府主义”，是带有革命色彩的空想类型的思潮。武者小路实笃的“理想主义”也属于空想类型。只有马克思主义思潮才是革命的且科学的，可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没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

至于大正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用一句话概括，即推动与维护了社会整合。他们是凭借社会运动来推动或维护社会整合的。社会整合无非是社会结构的三个组成部分——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彼此适应与协调发展，以确保社会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重要手段。在分析复杂的社会结构时，在分析方法上，我们可以先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求从复杂问题表象的背后找出一般规律性的东西。例如，虽然社会结构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立体结构，在对其进行分析时，我们可以将其平面化，这样更容易发现事物变换的规律。

如果把社会结构比做是大的三角形，那么社会结构的三个组成部分便是三角形内部互相相切并同时与三边相切的三个圆，社会要想保持稳定，必须依靠三者之间的适应。当三者势力均衡且又处于比较适应的状态时，三角形就会存在，社会就稳定、繁荣。反之，当三者之间势力不均衡且彼此处于不适应的状态时，

内田繁隆：《日本政治社会思想史——比较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研究》前野书店 1963年版；“序”，第6—7页。

三角形就很难存在，社会就会发生动荡。这种适应性规定着社会的变化。诚然，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结构是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基础，但如果没有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对它进行调节，为它提供条件，单靠经济结构本身并不能保持社会稳定。拿日本来说，明治社会整合的产物是政治上的君主立宪、经济上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文化上的国家主义。大正时期社会整合的产物则是政治上的政党政治、经济上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和文化上的“理想主义”。进而到了昭和初期，社会整合的产物是政治上的天皇法西斯体制、经济上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文化上的超国家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及他们发动的社会运动是社会整合的主要推动力量，只不过在不同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及采取的社会运动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在社会运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管知识分子影响或参与的某一社会运动的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它都会成为催促或推进社会整合的一种手段。关于社会整合，还可以认为：（1）社会价值观的相对一致性是社会整合的必要条件。（2）社会分工会带来社会秩序的重新调整，从而带来新的社会整合。（3）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及纷繁复杂的社会运动是促进社会整合的手段。例如，经济发展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知识分子便发起社会运动，并使其组织化。但社会运动给政府（权力机构）带来的震撼程度将视以下情况而论：（1）权力强大到还没有什么社会运动的力量能威胁其存在时，政府即要强制取缔运动以确保社会一时的稳定与繁荣，从而起到维护社会整合的作用，但这只是暂时的情况。（2）权力的强弱程度适中时，会带来社会运动的部分要求或目标的实现。因而，其目标或要求会成为政府重新制定方针所要考虑的因素。然后，政府作内部调整，以求达到一种新的社会平衡。（3）当政府的权力已经衰微到一摧即垮的程度时，那时社会运动即会发动社会革命，由此而完成新的社会

合。一个整合运动刚刚完成，新一轮的社会整合运动又重新开始。社会就是在不断地失衡与整合的过程中发展的。在这一点上，进一步推进“欧化”运动的大正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运动是引人注目的。

从上述对某些问题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中也可以发现，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南，结合西方社会学的先进成果来阐述问题。但是，就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这一题目而言，在具体的写作技巧上，基本上有两种写作风格。其一，是对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进行总体分类，然后以每一类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的整体为对象，不以其中的个案人物为代表进行研究及写作的方法。其二，与之相反，以每一类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的个案人物为代表类型进行研究及写作的风格。笔者所采取的是后一种写作风格。

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对大正时期的整体把握，即从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及国民心态的角度，探讨大正时期的特征；阐述大正时期“欧化”与“反欧化”思想的交锋，明治知识分子与大正知识分子在交锋过程中的作用；对大正时期政治思潮及其知识分子进行类型划分。第一章属于总论。从第二章至第六章，以五类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展开研究，分析他们在大正转型期的社会作用。第二章至第六章属于分论。终章综合分析归纳知识分子的总体特征，并进一步分析当前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与大正时期政治思潮的历史连续性。终章属于总论。可以说，本书采取了总论——分论——总论的结构。

#### 四

根据中日学界对该专题的研究状况，本书首先对大正时期做了总体上的把握，并阐述了“欧化”、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社

会运动的若干理论问题。但由于材料的局限，有关理论阐述在具体资料的论据补充方面尚有大量工作要做。另外，在分论的各章中，对人物个案的考察与研究方法与以往的研究则多有不同。通过这种考察，一定程度地明确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与周边环境的互动性。与此同时，本书在阐述中进一步提出或澄清了若干理论问题，其中较大且重要的问题及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知识分子的含义及人格结构的理论性认识。知识分子的含义是判明某人是否为知识分子的关键所在。这是确定研究对象的问题，只有研究对象清楚了，文章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关于知识分子的含义，学者们的见解各不相同。有观点认为，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在社会出现剩余产品和阶级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分属于不同的阶级。这一定义的客观性在于，它指出知识分子是代表不同阶级的。多数西方学者认为，知识分子既要有专业，又要有关注社会问题的“良心”。例如，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一书，所强调的即是知识分子所必备的两个要素。再如，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也强调指出知识分子应具备的基本要素。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则将知识分子的含义概括得更为具体。现代知识分子不仅应该具备上述两个要素，而且还要保持相对的独立和自由。按英克尔斯的观点，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现代人格结构（详见第一章第二节）。

然而，有时知识分子的人格结构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仅就知识分子人格结构变化而言，存在着人格转换的单向性与双向性问题。即是说，单向性指人格由独立转变为依附，或人格由依附转变为独立；双向性则指人格的转换经历了由独立——依附——独立，或由依附——独立——依附的过程。本书的第二章，将知识分子的人格由独立转向依附的现象称为知识分子人格的断裂，将对断裂的人格进行整合但以失败告终的现象称为人格